

第一章 历史源流与迁徙

瑶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瑶族共有 213.4 万余人，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江西等省区，其中半数以上分布在广西。云南瑶族人口有 17.3 万余人，仅次于广西、湖南，位居全国第三，主要分布于从文山州到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沿国界走向的云南南部各州县。其中有一半以上分布于文山州各县，以富宁县、麻栗坡县、广南县较多；红河州的金平县、河口县和西双版纳州的勐腊县也有较多分布；此外，红河州的屏边、元阳、绿春、红河等县，思茅地区的江城、墨江、景东等县，以及曲靖市的师宗县等都有分布。瑶族又是一个以迁徙著称的民族，跨居中国、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五国，是一个居住国家较多、分布地域较广的跨境民族，更有一部分旅居美、法、加拿大等国。

第一节 族称与支系

一、族称

在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都经历过融合、迁徙和保留其传统的发展过程。在长期的分化、改组和融合中，形成了后来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有的保留了原有的族名，而更多的是使用了新的族名。我国南部各族，在古代多数来源于蛮，上到远古时期

则与三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① 远古时居于长江中游的今鄂湘赣一带的广大地区的众多部落，史称“三苗”，或称“蛮”，因其居于中原华夏部落集团的居地之南，故又常被称为“南蛮”。如《战国策·魏策一》吴起云：“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大戴礼记·明堂》云：“南蛮、东夷、北狄、西戎。”《吕氏春秋·恃君览》云：“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这时的“蛮”主要是指活动在荆州地区的部族，故又被称为“荆蛮”或“楚蛮”、“荆楚”。^② 商周时期荆蛮与濮、越、巴、卢戎等交融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了秦汉时期，由于民族分布的变迁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史籍多在民族群体的名称之前冠以当时的行政区划或地区名，于是蛮族有了“武陵蛮”、“长沙蛮”、“五溪蛮”之称。后因行政区划变动，又有了“零陵蛮”、“桂阳蛮”、“湘州蛮”等称呼。“三苗”或“蛮”应包括了瑶族的先民在内。“荆蛮”在《诗经》的《小雅》和《采芣》中均作“蛮荆”。在与先秦的“蛮”有关的苗瑶语族、孟高棉语族或侗傣语族的语言中，被限制的名词在前，限制的名词在后的情况是常见的。^③ 所以“蛮荆”应是当时少数民族的自称，而“荆蛮”是按汉语习惯调整的结果。瑶族自称繁多，其中多数人自称“勉”（或译为“棉”）。汉语中的“蛮”字应是“勉”的音转，是汉语借用后强加于“勉”的贬义，而不是相反。^④

经过长期的融合与分化，在南北朝时期，瑶族始从信仰“盘瓠”的族群中分化出来，被称为“莫徭”。《南史》卷五十六《张

① 侯哲安：《三苗考》，载《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② 吴永章：《瑶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③ 罗常培、傅懋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3期。

④ 李增贵：《试说瑶语的“勉”》，载《民族语文》1981年第1期。

续传》云：“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莫徭”实乃“苗”之长声，“莫徭”急呼即为“苗”。^①因瑶族多山居，“历政不宾服”，实际上处于一种不服徭役之状态，致使史籍把“莫徭”附会为免服徭役。如《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云：“长沙郡又杂有夷蜑，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又如《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潭州下》云：“其俗有夷人名瑶，自言先祖有功，免徭役也。”至宋代，“莫徭”之称乃去“莫”字而仅留“徭”。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徭之属桂林者，兴安、灵川、临桂、义宁、古县诸邑，皆迫近山徭。最强者曰罗曼徭、麻园徭，其余如黄沙……等徭，不可胜数。”^②宋人把盘姓视为瑶的正宗，其他如雷、蓝、黎等姓呼为莫徭，后看成贗瑶。饶宗颐先生认为此乃宋人认为盘姓人口较多，又与盘古名字相等，于是视为嫡系之故。这是当时人们的认识之误，实并无真瑶、贗瑶之区别。^③自宋以后“徭”字一直沿用，但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趋向和民族关系的张弛变化，“徭”字的偏旁被频繁易用，反复出现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的变化，其中从清代《粤西丛载》到整个民国时期使用带侮辱性的“徭”字的时间最长。^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瑶族人民的意愿，统一称为“瑶”。

① 尤中：《苗瑶族古代史叙略》，载《西南民族研究——苗瑶族研究专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引自《文献通考·四裔五》卷三二八。

③ 饶宗颐：《泰国〈傜人文书〉读后记》，载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④ 赵廷光：《论瑶族传统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160页。

二、支系及其分布

由于瑶族内部各部分的历史发展不同，所处地理环境不同，民族交往也各异，从而在文化类型上形成了一系列多层次、多结构的文化特点，形成许多不同的支系。“支系”一词对于其他民族而言，也许是指同源的不同分支。但对于瑶族而言，却是指构成瑶族的同源或不同源的不同的人们的集团。费孝通先生曾就广西大瑶山五个瑶族支系的情况指出：“从语言上暴露出了这五种不同自称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来源，或者说，他们很可能原来不是一个民族的人，进入了这个山区之后才形成现在大瑶山的瑶族。他们不是出于一个根本的枝条，而是不同支流汇合而成的一条河。如果称他们是‘支系’，只是支流的意思。我觉得不如避开支系这种说法，而称作不同的集团。大瑶山的瑶族就是由这些集团凝聚而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①从瑶族的历史和现状看，他的这段分析对整个瑶族而言都是恰当的。当然，对整个瑶族而言，“瑶”始终是全民族的共称，他们有着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心理素质，有着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

我国瑶族支系较多，其称谓之多在中国各民族中是少见的。瑶族称谓分自称和他称两种，据统计，其自称有 63 种，他称自“莫徭”之名出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 390 种之多。^②又有人据 20 世纪 50 年代所进行的全国瑶族语言普查所获资料，

① 费孝通：《〈盘村瑶族〉序》，载胡起望、范宏贵《盘村瑶族》，民族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黄钰、黄方平：《瑶族》，民族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0～12 页。

提出瑶族自称只有 28 种。^①

瑶族在其内部交往中，常使用的是其自称。其支系的划分，以语言为标准比较符合实际。瑶族的自称据其所操语言可分为四组，即勉语集团、布努语集团、拉珈语集团和汉语集团，每个集团之下又可分为若干方言集团。勉语集团之下可分为三个方言集团，其中勉—金方言集团自称勉或优勉（或译为棉、育棉）、门、金底门、金门、黑尤门，标敏方言集团自称标敏，藻敏方言集团自称藻敏；布努语集团下分五个方言集团，其中布—瑙方言集团自称布努、东努、努努、瑙格劳、包诺、努茂、怀冬诺、布亚等，巴哼方言集团自称巴哼、巴哼迈，唔奈方言集团自称唔奈，炯奈方言集团自称炯奈，优诺方言集团自称优诺；拉珈语集团自称拉珈；汉语集团是汉化较深的瑶族，自称有炳多优、代奈江、优念、珊介、优嘉等。其中以自称“勉”、“金门”的最多，约占瑶族总人口的 70% 以上，遍及瑶族分布的 6 个省区。自称相同，语言即相同或相近；自称不同，语言也就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瑶族的他称更多，是其他民族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对瑶族的政治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居住地域和服饰等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而给出的称呼，比如盘瑶、盘古瑶、过山瑶、砍山瑶、蓝靛瑶、靛瑶、红头瑶、花蓝瑶、白头瑶、顶板瑶、尖头瑶、青衣瑶、平地瑶、高山瑶、深山瑶、山子瑶、沙瑶、生瑶、熟瑶、民瑶等等。他称有较强的随意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瑶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

云南瑶族的支系相对于其他省区而言要少一些，其自称和他称也就少得多。这些自称和他称虽无本质上的联系，却基本能对应起来。云南瑶族主要有以下几个支系：

①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 年版。

(一) 蓝靛瑶

属勉语集团勉—金方言集团，操金门土语。自称门、吉门、金底门、秀门、黑尤门等。“门”意为“人”的意思，吉门意为箐人，金底门为箐里人，“黑尤门”直译为“瑶人”。秀门是解放后才出现的自称，意为“瑶人”。他称蓝靛瑶或靛瑶，因妇女善种蓝靛和着蓝色衣服而得名。金平的平头瑶、河口和马关的白头瑶（或称白线瑶）、金平和河口的沙瑶也自称黑尤门，也属蓝靛瑶。白头瑶因该支妇女常以白棉线缠头而得名，沙瑶因他们居住在红河两岸，受到壮族沙人支系的影响而得名。在云南主要分布于麻栗坡、富宁、马关、西畴、广南、邱北、砚山、屏边、河口、金平、元阳、绿春、红河、勐腊、师宗、墨江、江城等县，几乎遍及瑶族分布区。

(二) 过山瑶

属勉语集团勉—金方言集团，操优勉土语。自称勉或优勉（或译为棉、育棉）。“勉”意为“瑶人”。麻栗坡、广南、富宁的大板瑶（或称板瑶），河口、金平、元阳的红头瑶，勐腊的顶板瑶等，均自称勉或优勉，均属过山瑶。板瑶因该支妇女头顶置一平板而得名，红头瑶因该支妇女头包红布而得名。其分布也较广。

(三) 山瑶

属布努语集团布—瑙方言集团，自称布亚，或称布努瑶，主要居住于富宁等县。

第二节 族 源

一、史前考古学文化与三苗

在我国古史中的传说时代，沿黄河、长江流域广泛地分布着

原始人类的文化群体。徐旭生先生把黄河中、下游的两个庞大的氏族部落群分别称为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把长江中游之氏族部落群称为苗蛮集团。^①三苗为苗蛮集团的主体。关于瑶族与三苗的关系，尤中先生认为盘瓠“其实是三苗中以犬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②学界对苗、瑶同源，多无异议。自南宋以来，学者多认为苗族与三苗有直接的亲缘关系，苗族是三苗的后裔。^③苗、瑶族同为盘瓠蛮的后裔，三苗的分布地域与后来文献中记载的盘瓠蛮的活动范围又大致重合，虽然古今学者只论及苗族与三苗的关系，而对瑶族与三苗的关系少有论述，但我们似乎可以说，瑶族先民与三苗有着亲缘关系。盘瓠图腾产生于瑶族先民尚居于长江中游的时候，后来三苗在与中原的华夏集团的战争中战败之后，才被迫南迁、西移。三苗的活动情况，在丰富的考古学材料中体现得尤为清楚、明显。

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已基本确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俞伟超先生就提出三苗部落的先民是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创造者。^④不久严文明先生把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古史传说中的各部落集团的活动区域相联系，划分了六大文化区，即中原文化区（三代文明）、甘青文化区（戎羌各族）、山东文化区（东夷诸族）、燕辽文化区（燕文化）、长江中游文化区（三苗部落与楚文化）、江浙文化区（古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尤中：《苗、瑶族古代史叙略》，载《西南民族研究》（苗瑶族研究专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③ 伍新福：《荆蛮、楚人与苗族》，载《西南民族研究》（苗瑶族研究专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④ 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载《文物》1980年第10期。

越族)。并指出这些文化区正是后来“民族文化区的萌芽”。^① 佟柱臣则把我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七个文化系统中心,认为这些中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若干部族文化形成的基础”,长江中游是三苗部族活动的中心。^②

学界多认为三苗部族文化起于屈家岭文化,但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源头可早到旧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的氏族部落文化,可分为萌芽与产生、形成与发展、繁荣与衰落三个时期,并且从早到晚一脉相承地发展,构成了三苗文化发展的全貌。^③

20世纪80年代中叶,湖南西部的澧水和沅水流域发现了数十处旧石器遗址,并且有一个从早到晚的相对完整的发展历程,有些遗存“反映了湖南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早期文化过渡情况”。^④ 这些旧石器遗存主要出土于河流阶地上,与其他地区的洞穴堆积遗存的地貌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其分布范围的西界和南界均大大超出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分布范围,西南到了沅江的支流沅水流域。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人口不断增加寻找更丰富的生存资源的过程中,沿着河谷地带,顺着水流流向,不断向平原地带迁徙,在距今8000多年前发展到了湖南西北部澧水中下游平原和湖北西部长江两岸,在这一带形成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彭头山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加之当时正处于全新世早期的升温期,促使彭头山先民初步形成了稻作农业的生产方

①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载《文物》1987年第3期。

② 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载《文物》1986年第2期。

③ 徐祖祥:《长江文化的考古学考察》,载《文明与遗传》,日本勉诚社,1997年版。

④ 袁家荣:《略谈湖南旧石器文化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式。他们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稻作栽培者。到距今7 000年左右,彭头山文化发展转化为皂市下层文化。这两支文化的原始居民在这一带定居下来,从事稻作农业、渔猎、采集等生产活动,基本形成了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体系的大致轮廓。原始聚落的形成、文化内部的地区性差异以及有了墓地等细节,表明氏族部落文化已经产生。

在大约距今6 000年前后,皂市下层文化又发展为大溪文化,至此,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体系基本形成,并构成基本稳定的格局。大溪文化的早期分化出关庙山、丁家岗、油子岭三个文化类型,^①各有自己的分布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氏族部落。由于它们在文化特征上有较大的共性,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当密切的亲缘关系。油子岭类型文化分布于汉水以东的今天门、京山一带,说明大溪文化早期该文化的居民就已开始向江汉平原腹地迁徙,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大溪文化晚期,整个文化的遗存在特征上逐渐趋向统一,开始融合成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势力强大的氏族部落集团。晚期可明确划分出来的就有大溪、划城岗、谭家岭、螺蛳山、曹家楼五个类型。^②它们从早期的文化类型中蜕变和分化出来,其社会内部特有的文化形态连结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此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兼有渔猎业、家畜饲养业、原始纺织业等。该氏族部落集团在大溪文化晚期阶段,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寻找新的生存环境,在江汉平原上以谭家岭类型文化所代表的部落为主要力量,沿汉水向北逐步发展,从而与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代表的部落频繁接触,并相持于汉水中游地区。大溪部落民在这里建立据点,逐渐形成曹家

①② 徐祖祥:《论大溪文化》,载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

楼类型文化。南北两支文化在汉水中游相遇，从考古材料看，此时尚未发生太大的冲突，还没有一个文化系统占据了另一个文化系统的居住地域的现象。大溪文化向东发展到今武汉以东的倒水、潆水流域一带，在这里形成了螺蛳山类型。该类型不断与仰韶文化以及东部相邻的薛家岗文化接触和交往，并对这两支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总之，大溪文化向北、向东发展和迁徙的趋势是明显的和相当猛烈的。

在大约距今5 000年左右，长江中游的氏族部落文化开始走向繁荣。这时大溪文化蜕变为屈家岭文化，该氏族部落集团的中心也由湖北西部和洞庭湖西北岸转移到了江汉平原，尤其是京山、天门、钟祥一带构成了本集团的核心。该集团的势力已十分强大，与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河村类型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占据了原属仰韶文化的河南西南部和湖北西北部一带。有人认为“大河村类型文化的主人，应是祝融部落先民”。^① 古史传说中，祝融部落主要是由炎帝族、黄帝族和东夷三大支融合而成，也许由于这个部落特殊的形成过程和复杂的渊源，还没有形成很大的向心力，给了屈家岭部落集团向北发展以可乘之机。正当长江中游氏族部落集团向北发展之时，整个仰韶文化内部发生了剧变，蜕变为处于向中原龙山文化过渡阶段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这又给了屈家岭文化继续向北发展的机会，以致在郑州、三门峡地区、晋南、陕西东部也发现了屈家岭文化的典型陶器。^②

屈家岭文化经过大约 400 年的繁荣，逐渐过渡到石家河文化。在石家河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的交界地带，继续进行着继屈

① 王震中：《大河村类型文化与祝融部落》，载《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② 向绪成：《试论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原始文化的关系》，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家岭文化以来的一系列戏剧性冲突，从而在其分布区域上表现出交错重叠的现象。到石家河文化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向南推进到了今南阳、信阳地区，石家河文化向南退缩，在一定时期内两大支文化相持于河南、湖北交界的均县一带。

石家河文化的社会经济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该文化社会发展阶段仍然处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已处于父系氏族公社瓦解、奴隶社会的某些因素萌芽的时期，墓葬中随葬品数量悬殊，并出现殉葬现象，说明阶级对立已经产生。这时还出现了文字的萌芽形态陶文和象征时代进步的红铜器。在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之末，石家河文化在来自北方的强大压力下出现土崩瓦解之势，在其之后甚至出现了文化断层现象。文化内涵与石家河文化相衔接的史前文化或青铜文化，在长江中游及其邻近地区，目前还没有发现。

长江中游氏族部落集团的分布范围，与古史传说中的三苗集团的活动范围大体上是吻合的。《战国策·魏策》云：“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五帝本纪》云：“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据徐旭生先生的研究，三苗集团的活动范围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这一集团的中心在今日的湖北、湖南两省。”^① 两者的主要活动地域更是完全吻合。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应当就是三苗集团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这个文化系统的发展状况，与古史传说中三苗集团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系统的瓦解，也与古史传说中尧、舜、禹征伐三苗的记载相符。华夏与三苗两大集团发生冲突的表面原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因，徐旭生先生认为是由于南方的三苗不肯采用北方的高级巫教。^①所谓“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尚书·吕刑》）、“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墨子·尚同中》）。通过对前述史前文化的分析，我们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个集团对生存环境的争夺。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三苗集团曾向北征伐，占据了中原华夏集团原拥有的湖北西北部和河南西南部一带，史籍中对此也多有反映。如《尚书·尧典》：“蚩夷猾夏，寇贼奸宄。”《书集传》云：“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国语·楚语》：“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注：“行其凶德。”这些记载应与三苗向北扩展势力使与之相邻的华夏诸部受到威胁有关。至于蚩尤与三苗的关系，据徐旭生先生的考证，蚩尤乃东夷之长，非三苗的首领，^②这种说法是合理的。随着南北矛盾的激化，在华夏集团势力强大之时，开始向南征伐。在中原地区奴隶社会产生的前夕，尧在华夏部落集团中取得统治地位，于是动用庞大的武力，南下丹江、汉水流域，向三苗集团进攻。《吕氏春秋·恃君览》云：“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徐旭生先生谓蛮、苗为阴阳对转。南蛮即三苗。《论衡·儒增篇》云：“尧伐丹水。”《竹书纪年》云：“尧五十八载，放子朱于丹水，故名丹朱。”尧攻占了丹江流域，以封其子丹朱。石家河文化晚期所代表的三苗，则退出原占据的河南西南部，退守在湖北均县一带。这就是多次见于史籍的“丹水之战”。舜继任华夏集团的首领后，继续攻打三苗。《韩非子·五蠹》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尚书·舜典》说，舜“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舜对三苗采取分化瓦解策略，西迁一部“以变西戎”（《史记·五帝本纪》），对其余部分则

① ②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迫使南迁。《荀子·议兵》云：“舜伐有苗。”《战国策·秦策》云：“舜伐三苗。”《吕氏春秋·召类》云：“舜却苗民，更易其俗。”三苗集团经几次大的战争和波折后，势力仍然比较强大，继续与华夏集团对抗。禹时又对三苗发动战争。《墨子·兼爱下》引《尚书·禹誓》：“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他率领众多邦国的君长大举进攻。《尚书·大禹谟》云：“七旬有苗格。”《墨子·非攻下》对这场战争的惨烈作了详尽的描写，“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战争经过数十天，三苗被打败。三苗地广族众，不可能被尽杀，相当一部分相率迁入华夏王朝难以控制的深山中，开始了其独特的社会适应和文化调整；一部分“有苗氏来朝”，臣服于华夏集团；还有一部分逐渐变易其俗，接受了华夏民族文化，逐渐融合到华夏族中去了。自此，古籍中不再有关于三苗的记载，可见这次战争影响的深远。

二、商周时期荆蛮的发展

商周时期，在原三苗的居地上生活着的各部族被史籍统称为“荆蛮”或“蛮荆”、“荆楚”。如《诗经·商颂·殷武》：“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诗经·小雅·采芣》：“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征伐玃狁，蛮荆来威。”

关于当时“荆”或“荆州”的地望，《尚书·禹贡》说：“荆及衡阳唯荆州。”《史记·夏本纪》所载与此同。《尔雅·释地》曰：“汉南曰荆州。”《尚书·正义》卷六说荆州“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孔颖达疏：“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南及衡山之阳。”由此荆州之地即今湖南、湖北及其邻近地区，正与三苗活动的中心区域重合。留在原居地和向南、向西迁徙的三苗经过发展、振

兴，至商、周时又兴旺起来，并不时与中原华夏族发生经济文化的交流，时人因地名而称之荆蛮或蛮荆。但经过各部族长时期的分化和融合，此时的荆蛮应包括了部分南移并“蛮化”了的华夏族。

从商代前期至西周末年，日趋强盛的荆蛮与中原商、周王朝的关系经常发生变化，时而臣服，时而又起来反抗，战事不断发生。如《竹书纪年辨证》卷一：成汤时“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毛诗·正义》：“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诗经·商颂》：“挾彼殷武，奋伐荆楚。”大概荆蛮趁商周朝代更替之际又不断发展壮大，并对周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后汉书·南蛮传》：荆蛮“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故而从周昭王至西周末，周王朝多次对南方发动战争，规模之大在当时也并不多见。

西周之初，荆蛮之中的先进部分建立了楚国，但其活动地域还很小。《史记·孔子世家》载：“楚之祖封之初，号为子男五十里。”至楚武王时，疆土也不过百里。至春秋中叶以后，楚国的势力才逐渐强大起来，并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因楚族在荆蛮中势力显赫且声名远扬，故荆蛮又常被称为荆楚。荆蛮中的落后部分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与楚族不同的部落群，在楚国势力强大之后，均归于楚的统治之下。^①其中一部分在江汉平原及邻近地区与他族杂处，大部分则居于长江之南，在中原商周王朝的征伐下，更加剧了向南、向西迁徙的趋势。其中就包括瑶族的先民在内，故《册府元龟·外臣·国邑》卷九五七

^①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瑕。庄王初立，民饥兵弱，复为所寇。楚师既振，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又《左传》襄公十三年：楚“抚有蛮夷，奄征四海”。

云：“荆蛮，盘瓠之后也。”

商周时期，在荆蛮活动的广大地域内，尚有濮、越、巴、卢戎等族与之杂居。随着荆蛮的发展，其活动能力已达到可以比较广泛地同其他文化相接触并相互发生影响的程度，其文化的内部，就不会只有一种属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因素，而各民族间的混杂、融合、分解也随之发生。

濮是江汉一带及其邻近地区的一支古老的民族。在先秦的典籍中，将“蛮”与“濮”分别叙述，可见两者是可以分辨的。如《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因濮人分为若干的小集团，故又称“百濮”。濮实也为蛮，应是三苗后裔的不同称呼，在商周王朝对荆蛮的征伐中，有一部分濮人随蛮族一起南迁。春秋初年楚国开始向南发展时，“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① 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② 首先开拓的就是濮地。《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吕思勉先生论及此事时说：“后来所辟黔中郡，疑亦濮族之地。”^③ 有人更明确地指出：“湘西丘陵地实为古‘卜’人或‘濮’人的宅住地。”^④ 另有一部分濮人迁徙至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⑤ 与当地土著民族混合，汉代以后称为“僚”。^⑥ 居于黔东湘西的这一部分濮人，在楚的征伐下臣属于楚，但相当一部分仍保留了传统文化。这一带本为蛮族的主要聚居地，濮人迁来以后，与蛮杂

① 《国语·郑语》。

② 《史记·楚世家》。

③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④ 田曙岚：《论濮、僚与仡佬的相互关系》，载《思想战线》1980年第4期。

⑤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⑥ 蒙默：《夔为僚说》（上、下），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7年第1期、1978年第1期。

处，加快了文化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民族间的整合也必然发生。有人认为沅江中上游的商周时期的考古学遗存，在春秋时期楚人进入之前，其创造者的族属是濮，^① 联系到蛮族的存在及与濮杂居的情况，当为蛮、濮的遗存似更恰当。由于楚人在这一带活动时间较短，加之山高林密的自然环境，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遗存的文化内涵甚为单薄。如在溆浦、辰溪、古丈等地发掘的战国楚墓全为中、小型墓，出土器物中兵器占了较大的比例，溆浦马田坪楚墓中有一半以上出土兵器，而兵器数量占所出铜器总数的绝大多数，“表明墓主人都是楚国的军旅武士”。^② 这正表明了楚文化在这一地区发展的特殊性。正因为这一特征，楚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相当有限，濮、蛮文化的传统因素也才得以保存下来，构成后来武陵蛮的重要组成部分。

越人在商周时期也是湖南的主要民族之一，在湖北江汉一带也有少量分布。洞庭湖以东、以南地区，在商至西周时期，主要属于越人的活动区域。有学者分百越为南越、西瓯、吴越（包括东瓯、闽越）、骆越四种，认为其语言、风俗习惯、分布地域各不相同。^③ 湖南境内越式器物，与广东西部春秋晚期至战国墓葬以及广西东部战国墓葬所出器物特征相同。“湖南南部，战国中晚期的越人墓即可纳入两广区范围，从春秋以后，遗址的文化面貌即逐步与两广接近。粤东，商和西周时期，与闽南有较多相似

① 何介钧：《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区探索》，载《湖南考古辑刊》第二辑，岳麓书社，1984年版。

② 吴铭生、贺刚：《试论湘西战国时期楚文化的特征》，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

③ 蒙文通：《百越民族考》，载《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5页。

之处，而至春秋战国，无论遗址和墓葬，均可纳入两广范围。”^①而这一带西汉初年为南越之统治中心，由此可知湖南境内与蛮杂处的越人当为南越。

西周晚期楚的势力开始进入洞庭湖以东地区，春秋晚期进入以南地区，越人的势力则逐步南移，这在考古学材料中有明确的反映，^②与古文献的记载也是一致的。《史记·楚世家》载：“成王恽元年，初即位……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楚成王沿洞庭湖东部向南扩展，所遇到的除蛮族外，也有越人。《后汉书·南蛮传》云：“吴越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苍梧指九嶷山及邻近的五岭南北地区，^③即今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三省交界地带。这一地区至今仍为瑶族分布区。东周时已有部分蛮族迁入，与越人杂处，故吴越的南征称为“南并蛮越”。湖南南部资兴旧市战国墓中，楚与百越文化遗物共存，^④说明楚文化虽发展到了此边远地带，但已是强弩之末，当地土著文化的传统仍然是存在的。

自商以后，蛮族数次南移，从而与越人接触甚至杂处交融，所以其文化中吸收了越人系统民族的一些因素，甚至有部分越人

① 何纪生、何介钧：《古代越族的青铜文化》，载《湖南考古辑刊》第三辑，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② 黄纲正：《楚文化在湖南的发展历程》，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

③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读史方輿纪要》引孔颖达曰：“九嶷即苍梧山也。”

④ 吴铭生：《资兴旧市战国墓反映的楚、越文化关系探讨》，载《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岳麓书社，1982年版。